

江泽民与中美关系*

倪世雄

[摘要] 本文着重概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和对美方针,有声有色地处理中美之间发生的人权、安全、产权、主权(台湾)等方面的障碍和冲突,坚决果断地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几次严重危机,把中美关系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9)06-0056-09

1989年6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表现出坚定、稳重和自信,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中美关系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1989年“六·四事件”严重地冲击了中美关系,两国关系陷入一场突发的危机。面对危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与美方一起努力挽救濒临破裂的中美关系。

为了处理危机,改善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先后访华。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继6月访华后,12月9日再次来到北京,受到邓小平的破例接见,江泽民也在当天接见了美国特使,发表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一篇谈话。江泽民的谈话显示了对中美关系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讲话全面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和分歧点,指出“发展中美关系要向前看”。他说:“在这个不断变化动荡的世界上,中美两国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共同利益和共同点。我们相信,只要双方都向前看,真诚地从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1](p.85)}

然而,“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的修复过程是缓

慢的,而且困难重重。从最惠国待遇到人权,从贸易逆差到知识产权,从地区安全到核不扩散,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双方摩擦接连不断。这一情况基本上持续到1992年美国大选。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又经历了一番起伏波折,人权、台湾、贸易、安全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两国关系。但是,由“六·四事件”引发的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一变化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务实的对美政策有关,即“既斗争又接触,既冲突又合作;斗争而不破裂,冲突而不对抗”。

2月23日,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一行的采访。江泽民说,发展中美关系一要有长远眼光,两国不论在双方关系方面,还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方面都有着广泛而重大的共同利益;二要妥善处理分歧,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要让分歧来妨碍和损害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我们愿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同克林顿领导的美国新政府一起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作出努力。^①

5月21日,江泽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的采访。当被问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时,江泽民说:你提这个问题,不禁使我回忆起21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访华,一抵机场,他就申明,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来。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总是要考虑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美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否则就不会有双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05JZD00040]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93年3月9日。

方20多年关系的发展。今天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但中美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和其它方面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对于双方存在的分歧,我想可以通过对话解决,解决不了也可以求同存异。在这里,我愿意重申:我们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7月12日,江泽民在驻外使节会议上作《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对美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他指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仍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互有需要、进行合作的一面。……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1]p.312}他强调:“如何同美国打交道,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简要说,既要有斗争也要有妥协,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目标。当前,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并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一些积极姿态。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多做工作,争取中美关系尽早走向稳定,并不断有所改善和发展。”^{[1]p.313}

接着,遵循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想,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江泽民又择机正式提出了对美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993年里,他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和重申了这一方针。这16字方针不仅在当时起了恢复改善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而且在以后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

1993年下半年,在一系列高层互访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机。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出席11月下旬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实现了中美首脑正式会晤。

11月19日,江泽民与克林顿在西雅图的雷尼尔俱乐部举行正式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的首次晤谈,对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江泽民用了15分钟时间以“独白”的形式给克林顿“上课”,教育他不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性。^①江泽民谈了新世界多极化后,还对克林顿讲了世界多样化问题。他说,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社会发展经历各异,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各国人民根据他们各自的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

度和发展模式,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世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好事,不是坏事。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②克林顿当即表示,江泽民主席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③

20日,江泽民在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与克林顿的会晤“谈得很好,气氛是友好的,态度是坦诚的,会晤是建设性的”;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其意义不限于双边,处理中美关系应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关于中美之间的分歧,双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强加于人的作法。江泽民指出,中美首脑会晤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④

1994年,中美关系继续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发展。5月26日,克林顿发布“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提议将此与人权问题脱钩。他还表示与中国扩大交往、扩大贸易、扩大在国际上的合作,携手建立一个长期的战略关系。至此,从“不可谈判”到“可谈判”,从“挂钩”到“脱钩”,经历了近五年折腾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经贸、军售三挂钩问题终于划上了句号。当然,“三脱钩”不等于“三解决”,中美在人权、经贸、军售、港台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是,从“三挂钩”到“三脱钩”无疑是一个进展,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11月14日,在出席于印尼雅加达召开的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和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这是继1993年11月西雅图会晤之后两国首脑之间的第二次重要会晤。江泽民在会晤时指出,中美之间应该并完全可能建立建设性的新型关系。他提出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双方共同确立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第一,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发展。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及环保、缉毒、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协作。第五,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江泽民还说:“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搞好了,我们就能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

① 参见 New York Times, Nov. 20, 1993.

② 参见钟诚:《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2日。

④ 同上

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关系搞僵了,对各方都没有好处。”克林顿表示同意江泽民的看法。双方都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成为互利合作的良好伙伴。^①

二

在这一阶段,台湾问题也经历了起伏。江泽民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台湾问题,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的对台思想和方针,形成了有特色的对台工作局面。

1993年4月27日至28日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后,有关两岸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白皮书》的发表和“江八点”的提出。

“江八点”讲话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关于两岸关系、国家统一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江八点”的发表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但是,正当两岸关系向前推进形成新的趋势时,一股逆流已在涌动。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与此同时,美台之间却搞起了“私人访问热”:自1989年后,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方面的高层人士蒋彦士、陈履安、邵玉铭、赫柏村、章孝严、钱复、蒋纬国、李焕、宋楚瑜和林洋港等访美;台湾方面则邀请包括福特、克莱普、米西、卡卢奇、舒尔茨和希尔斯等美国前总统、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访台。福特成为第一个访台的美国前总统,贸易代表希尔斯成为美台断交以后访台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在美亲台势力和美国国会推波助澜,使事态进一步向消极方面发展。少数台独分子和在美亲台势力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李登辉访美。正式访问不可能,就请李“私人访问”、回其康奈尔大学“母校”参加毕业典礼。美国政府虽然起初表示不同意,但态度暧昧。1995年5月2日,众议院以396:0票数,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美决议案;5月9日,参议院则以97:1票通过相同的决议。5月22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美国国务院关于李登辉访美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关于允许李在内的台湾高级领导人偶尔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的政府规定修改之后作出的。^②

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助长了台独势力,恶化了业已改善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出现

了危机。6月16日,中国政府召回李道豫大使述职,两国关系自1979年建交以来第一次出现双方无大使的局面(美驻华大使芮效俭因任期结束回国),这是1979年建交以后两国外交关系的最低点。同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鼓吹国家分裂、蓄意制造两岸紧张气氛,使原定于7月份的第二次汪辜会谈不能按期举行。^③6月30日,江泽民严肃地指出:“最近,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我们理所当然要作出强烈反应,美国政府最终要为其错误决定付出代价。”^④

在中美这场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终于使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出现转机。

10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江泽民接受了《侨报》记者的采访,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以‘主权在民’为借口,搞分裂祖国的勾当。国家主权是不能分割的,中国的主权是十二亿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共有的。台湾岛上一些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⑤10月24日,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是1993年以来中美首脑的第三次正式会晤。在会晤时,江泽民重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仍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他还强调指出,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也是台湾问题。中国不希望看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再次发生。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的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才是正确的。美国重申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在会谈中,江泽民提出了中方的四点主张:(1)登高望远,两国领导人应从战略的高度,从世界大局和21世纪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2)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证明,只要三个公报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发展;相反,就遭受挫折,甚至倒退。那种认为三个公报已经过时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3)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对待。为了发展和扩大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一种平等、协商、合作的精神处理相互间

① 参见刘连弟、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471页。

② 参见刘连弟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 参见新华社北京1995年6月17日电。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95年7月1日。

⑤ 参见新华社纽约1995年10月23日电。

的一切问题。任何施压、“制裁”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4)十分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中方反复谈这个问题,就是出于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考虑,不希望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再出现大的波折。^①

中美两国首脑在纽约的正式会晤取得了成功,由于这次首脑会晤对中美双方都很重要,原定半小时的会晤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前两次会晤中是没有过的。这是一次坦诚、积极、有益的会晤,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使中美关系结束“大落”状态,出现“大起”势头。克林顿称这次会晤是很好的、很积极的、是他迄今为止同江泽民举行的三次会晤中最好的一次。新闻界则称这次会晤“显示出中美关系雨过天晴的好迹象”。李道豫大使陪同江泽民主席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庆典活动和中美首脑会晤之后就留在了美国。

1996年是美国的又一个大选年,也是中美关系的调整年。中美关系中“台湾周期”并没有完全过去,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动荡到平缓的过程。

3月23日,台湾进行所谓的“总统选举”。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于3月8日和3月12日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海空实战演习。这完全属于正常的演习和国家的内政。然而,美方除了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外,还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蓄意制造事端。美国竟然于3月中旬向台湾海峡附近派遣两支航空母舰特混队“独立号”和“尼米兹号”,向我国耀武扬威,严重地加剧了台海的紧张气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96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危机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导致的紧张关系的继续,它曾一度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跌入1989年以来的又一个低潮。然而,在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困难时,双方尚能顾全大局,采取积极的态度,推动中美关系得以改善。

11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刚竞选连任不久的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自1993年西雅图会晤以来的第四次会晤。约70分钟的会晤气氛是积极、友好和建设性的。双方认为,会晤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江泽民首先祝贺克林顿连任成功,克林顿表示感谢,江泽民指出,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有利于缩小双方之间的分歧。克林顿则说,美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稳定、安全的中国,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②两国首脑商定,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进行正式互访。两国首脑马尼拉会晤为中美关系

的恢复改善提供了一个关键性契机。

三

在经历1996年从动荡到平稳的变化后,1997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势头。江泽民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时指出,几年来,中美关系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向前发展的。他特别强调出现两个“明显”:目前两国关系的气氛明显改善,发展两国关系的有利条件明显增多。^③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访美和克林顿访华,成为这一积极势头的主要标志,两国首脑互访甚至被称为是“重新正常化”。^{④⑤}

3月24日,美国副总统戈尔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江泽民在会见戈尔时提出,为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中美双方应把握三个原则:(1)始终把握两国间的共同利益;(2)处理中美关系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如中国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所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3)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④

10月26日至11月4日,江泽民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0月29日上午,克林顿在白官南草坪为江泽民正式访美举行欢迎仪式,3000多名来自美国各界人士鼓掌或挥动中美两国国旗欢迎江泽民的到来。这是中国国家主席12年来首次对美的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都高度重视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10月30日,江泽民出席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的早餐会,与持对华不同立场的50多名议员进行了友好、坦率的谈话。一些议员提出关于中国的人权、堕胎、宗教自由、政治体制等刁难性问题,江泽民没有回避,而是做耐心细致的解答。江泽民说,我此行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发展中美关系在美国有广泛基础,得到人民支持,也得到两党的一致赞同。两党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今后,更需要两党的一致支持。一年多来,已有100多名议员先后访华。中方重视国会在对华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希望国会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继续做出积极努力。^⑤

11月1日上午,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最大的桑德斯纪念会讲堂发表了题为《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江泽民一开始回顾中美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历史和作用。他说,中国与美国应该相互了解,唯有相互了解,才能增进信任,加强合作。江泽民详细介绍了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文化进程形成的团结统一、独

① 参见新华社纽约1995年10月24日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5日。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11月15日。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97年3月27日。

⑤ 参见钟诚:《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立自主、爱好和平和自强不息的四大传统,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对全世界的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今天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实行的内外政策,确定的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既有现实的根据,又有历史的渊源;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潮流,又具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掌握这一点,乃是了解和认识中国现状与未来的关键。

江泽民指出,中美应该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泽民最后引用了哈佛校门上的一句话:“为增进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他说:“中国青年也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希望中美两国青年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相互学习,增进友谊,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①哈佛师生对江泽民精彩生动、丰富深刻的演讲报之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江泽民这次访美9天的行程丰富紧凑,访问了夏威夷、威廉斯堡、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7个城市,与美国各界人士广泛交谈,与议员、州长、市长、学术界、商界、华侨、华人等各界人士会面35次,演讲30次,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上述各项活动中,江泽民高瞻远瞩、信念坚定、和蔼可亲、机智幽默的外交风采,以及凝重自信、富于人情味的个人魅力,风靡美国,树立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尚风格和美好形象。^②11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江主席访美是“中美关系结束过去几年来的波折起伏,开辟新的未来的重要标志。”^{[3]p.186}11月7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发表谈话,认为江主席访美“从美国政府角度看,确实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p.187}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江泽民对此作出很高的评价:“中美两国元首成功实现互访,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对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③

四

对中美关系来讲,1999年是极不平凡,甚至惊心动

魄的一年。“5·8”炸馆事件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震撼和无比的愤怒。中国政府立即发表严正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罪行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愤慨。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④

5月10日,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通了电话。江泽民说,5月8日事件是一种极其野蛮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负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⑤5月11日,江泽民和朱镕基分别会见了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江泽民说,北约必须按照中国的严正要求做出交待。朱镕基说,这一暴行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侮辱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两位领导人同时呼吁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空袭,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南斯拉夫危机。^⑥5月12日三位烈士的骨灰回到祖国的怀抱,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社沉痛哀悼三位烈士。5月13日,北京召开大会,江泽民在讲话中全面阐述对南斯拉夫问题和对5月8日事件的严正立场,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再次宣布中国将把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21世纪。江泽民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一切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⑦这段话给大家无比的激励和力量。

炸馆事件后,中美关系从紧张转向缓解的真正的标志性机会是1999年9月新西兰奥克兰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和克林顿的正式会晤。9月11日,中美两国首脑再次会晤。这是江泽民与克林顿的第八次会晤,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炸馆事件发生后给两国领导人一次面对面对话的机会,意义不凡。

奥克兰会晤对中美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再次使中美关系从危机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

根据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奥克兰会晤中所商定的,中美立即恢复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双边磋商。9月27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华盛顿举行正式会谈。虽然没有出现最后突破,但谈判是有益的。11月9日,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美国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从11月10日至15日进行了新一轮谈判。最终,中美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① 参见新华社波士顿1997年10月30日电。

② 参见周溢潢:《中美关系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

④ 参见新华社北京1999年5月8日电。

⑤ 参见新华社北京1999年5月10日电。

⑥ 参见新华社北京1999年5月11日电。

⑦ 参见新华社北京1999年5月13日电。

签字仪式后,巴尔舍夫斯基说,在双方签署协议之前,她曾给克林顿总统打过电话。克林顿总统委托她当面向江主席表示感谢,他认为,正是江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才使得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①

2000年,中美关系进入关键的恢复改善阶段,而对这一恢复改善最积极的推动力是“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的通过。5月24日,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众议院以237票对197票通过给予中国PNTR。消息传来,江泽民感到欣慰。5月28日,他与克林顿通了电话。江泽民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及各界有远见的人士,特别是总统先生本人,为实现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出了很大努力,我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前几天,美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支持美对华实现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是明智的,尽管这个议案附加了一些中国不能接受的内容。我一直认为,早日解决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江泽民说,自1993年我和总统先生在西雅图首次会晤至今快8年了。8年来,虽然中美关系经历过波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改善和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双方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时代潮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美双方坚定不移地确保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克林顿表示,他对美国会众议院通过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本人和美国政府都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过去8年来,江主席和他本人一直为两国关系改善与发展而努力。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解决,一定会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的基础。他表示,美政府将努力推动美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这一议案。^②

9月19日,美国会参议院也以83票对15票通过了PNTR。10月10日,白宫发表“事实通告”,宣布克林顿总统签署两院通过的第4444号决议,批准给予中国PNTR,结束了20年来国会每年一度审议的做法。

2000年下半年,由于PNTR顺利解决的推动,中美关系恢复改善的势头明显加强。8月15日,江泽民就是以这种心境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就中美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回答了他的提问。

关于中美关系,江泽民说,1993年,我见到克林顿总统时就对他说,我们应该登高望远,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向新的世纪。中美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

云密布,有时也多云转晴。美国有的人不希望中美两国友好,总是有些噪音。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把自己估计得过高。美国的政治家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有12亿多人民,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相当的国力基础,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应该努力使得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前进。美国两党任何一个候选人当选下届总统以后,从全世界的战略利益考虑,都应该进一步促进中美的友好关系。^③

9月6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总部举行,江泽民主席与世界1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9月8日,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晤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同一天,江泽民在纽约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长篇演讲,全面论述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江泽民说,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愿望始终推动着中美关系向前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美建交以来的21年里,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11月中旬,江泽民赴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参加APEC会议。16日,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会晤。这是自1993年西雅图会晤以来的第十一次会晤。江泽民对克林顿执政期间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所作的积极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克林顿感谢江泽民8年来同他进行的合作。他说,我们多次进行过坦率的交谈,并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努力加以克服,从而使得中美关系不断取得进展。江泽民回顾两国关系发展历程时说,8年来,中美关系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但总是向前发展的,是取得了重要的积极进展的。

五

2001年,中美关系进入调整年。美国大选后,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布什新政府初期,咄咄逼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打台湾牌,决定新一轮售台武器,向中国大陆施加压力。布什政府把中美关系拉入怪圈,中美关系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11月16日。

^②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0年5月28日电。

^③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0年9月4日电。

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作了精彩深刻的阐述。朱镕基说:“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朱镕基指出,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①

3月20日,江泽民主席亲切接见基辛格博士及其率领的美中协会代表团。江泽民说,他一贯认为,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应站得高,看得远,牢牢把握中美共同利益,推动中美关系在21世纪持续向前发展。他希望双方加强接触与信任,扩大交流与合作。他期待着与布什总统为这一道努力。他还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出现了一种现象: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和关系改善的渐进性。1999年“炸馆事件”尤为明显。2001年中美关系又一次呈现这种现象。

2001年4月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随后,两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根据“美方道歉、中方放人”的原则,在10天左右处置好了事件,避免事态恶化。撞机事件说明了中美关系具有反复性和突发性,但中美关系逐步成熟了,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双方表现出排除危机和管理危机的能力。中美关系在撞机事件后,逐渐得到了恢复,呈现改善的迹象。

7月5日,江泽民应约与布什通了电话。江泽民首先就美国“独立日”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他说,前一段,中美关系遇到了困难。但近来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江泽民说,中美是对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以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中美之间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我们应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布什说,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美中之间应有良好的对话。中国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国家,他尊重中国,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合作的领域。^②

2001年9月11日,是震惊世界的一天,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处遭到恐怖主义的突然袭击,造成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当天,江泽民致电布什:“惊悉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③

第二天,江泽民应约同布什通了电话。江泽民说,我们十分关心救援工作的进展。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他表示相信,在总统先生领导下,美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当前困难,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恢复社会和生活秩序。江泽民表示,我们愿意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希望两国外长和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加强磋商与合作。^④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及其影响,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和方式表达了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谴责,对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对开展国际反恐斗争的决心。这表明,中美之间始终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能经受国际风云的考验。

10月19日,APEC会议开幕前夕,布什来到上海。在西郊宾馆,两国元首会晤近三小时,随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江泽民说,刚才我与布什总统举行了很好的会谈。这是我们首次见面。我们就中美关系、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中美国情不同,存在一些分歧并不奇怪。我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美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在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江泽民强调,中美关系正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开展高层战略对话,推进经贸、能源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在重大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6日。

②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5日电。

③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1年9月11日电。

④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1年9月12日电。

国际及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

布什感谢江泽民主席的接待。他说,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他上次来此是25年前,当时根本未想到2001年上海会是今天的面貌,上海真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城市。他说,中国对“9·11”事件立即做出了反应,中国人民毫不犹豫地在这个困难时刻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美方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是我们面临的共同威胁。我们认为美中应携手合作,来打击共同的威胁。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愿意同中国一起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①

两国元首在上海APEC的会晤,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双方积极准备布什访华的同时,两国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江泽民于11月12日晚在北京与布什通了电话。江泽民说,中方期待着与美方密切合作,为促进中美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努力。布什祝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说,正是由于江主席和中国政府富于远见卓识的努力,才最终实现了中国入世的目标。布什表示,美方愿与中方一道,推进中美关系。^②

中美确定“建设性合作关系”目标后的最重要事件是2002年布什与江泽民以工作访问的形式进行的互访。

2月21日至22日,布什对中国的工作访问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2月21日访华的日期是布什亲自精心选定的,不仅因为他父亲老布什1989年2月曾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访问,而且更是因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历史性的访问就是从2月21日开始的。他的访问与30年前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恰成“历史性巧合”,这本身表明布什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表明他将继承尼克松的对华友好政策,表明他希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和愿望是真诚的。

2月21日上午,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先后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其他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江泽民说,4个月前我们在上海进行了很好的会晤,今天重逢格外高兴。我们在上海会晤时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这就是中美共同努力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4个月来,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有了新的进展。两国关系的发展势头是好的。对此,中美两国人民高兴,世界人民也高兴。江

泽民说,总统先生是在中美关系处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访华的。30年前的今天,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结束了两国相互隔绝的历史,开始了交流与合作的进程。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所迈出的步子已为历史所验证。30年后的今天,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对世界和平肩负的共同责任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世界期待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江泽民就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势头、充实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双方应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增进了解和信任;第二,双方应加深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第三,双方应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特别是台湾问题;第四,双方应当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应经常沟通,加强合作。布什表示赞同中方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他说,美国政府期望在各个领域扩大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对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合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10月22日至24日,江泽民应布什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访问。这是他主政时期最后一次访美。重头戏是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演讲和两国元首在克劳福德牧场的高峰会晤。

10月24日,江泽民一行来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访问,江泽民在该校的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用英语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他借孔子思想阐述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君子和而不同”,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演讲结束时,江泽民说:“让我们呼吁中美两国继续共同努力,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③江泽民演讲得到了包括老布什总统、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中国篮球巨星姚明在内的600多位听众的热烈欢迎。

10月25日,江泽民一行做客克劳福德牧场。当天

①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1年10月19日电。

② 参见新华社北京2001年11月12日电。

③ 参见新华社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城2002年10月24日电。

上午11点左右,迎来江泽民夫妇后,布什亲切地说:“白宫不是我的家,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我只把最好的朋友请到家里做客。今天,我是以家庭式的聚会接待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4](p.646)}布什亲自驾车带江泽民夫妇参观牧场后,两国元首举行了“促膝谈心般”的正式会晤,气氛十分轻松、愉快,交谈十分广泛、深入。内容涉及反恐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经贸问题、军事交流问题、朝鲜核问题和伊拉克问题等。布什说,现在,我俩可以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了,以前还做不到,这应归功于江泽民主席。自从第一次同江主席见面以来,双方之间的个人关系及中美关系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美方愿同中方发展坦率、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中美发展强有力的关系有利于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

江泽民这次出访具有特殊意义,是一次承上启下,开拓未来的重要访问。

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新世纪新形势新行动——热烈祝贺江泽民主席出访圆满成功》,全国各报均在显著的版面予以转载。社论指出:“江主席这次访美举世瞩目。布什总统特意安排在克劳福德自己的牧场接待江主席,体现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就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再次强调了中美平等友好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的重要性。”社论认为,这次出访取得了圆满成功,对加深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相互信任、推进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发挥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社论还指

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全局,推动两国关系克服种种障碍,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中美作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责任,应该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增进相互信任,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平竞争,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共同进步。^①

这篇重要社论最直接地传递了中央的声音,对自尼克松访华以来30多年中美关系的历程作了深刻全面的总结,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作了精辟有力的阐述,对中美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作了坚定乐观的展望。

一个星期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接班,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的努力的基础上,把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继续向前推进。

责任编辑:云尔

[参考文献]

- [1]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20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3] 刘连弟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年—2000年大事纵览[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 [4] 钟诚.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10月30日。

sump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a special problem in China's macro-economy, which has been increasingly severe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high saving is one of the causes, but not the essential one. On the basis of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eople's consumption level,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al explanation about the causes and suggests that policy should be made to encourage people's consumption and makes comments on the measures to stimulate the domestic demands. (HUANG Ye-j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ystem Changes: 60 Years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the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has made great changes, experiencing exploration, adjustment and transi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experiencing difficulty and exploration, great achievements marked by the success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have been made and great contribution has been done in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unity. In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for the national defen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ts direct significance lies in that the industry finds itself the direction and focus of further reform to realize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The 60-year-old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is now facing a new start point and new challenges. (FAN Zhao-zhen)

From Substantial to Procedural Rule of Law: the New Progress on the route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 Currently we should shift our focus from the substantial aspect of rule of law to both substantial and procedural aspect, which is ou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the route of rule of law.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and value of the procedural aspect demonstrates that it has its own advantages.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procedural aspect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goal of rule of law.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thoughts and ideas of the procedural aspect.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focusing on procedure while neglecting substantial law should be altere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deserve full respect and social justice and harmony need to be safeguarded through procedural justice. As the procedural aspect is an original part of rule of law, we need to respect the idea of procedure, set up scientific and just procedural laws, and strengthen the progress of procedural aspect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law, to realize the goal of rule of law. Criminal procedure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in this process. (WANG Yong-jie)

Jiang Zemin and Sino-US Relations : The paper describes how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CCP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Jiang Zeming as its co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and their policies toward the USA, and how they successfully dealt with those obstacl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ver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security, Taiwa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Firmly and maturely overcoming several grave crises which occurred in 1990's, Jiang Zemi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rought Sino-U.S. relations to a new phase of development, and thus made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up of China's new diplomacy. (NI Shi-xiong)

Europe's "Post-modernity" and its Knowledg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 : China's rise makes China all the more important for Europeans and Europe has to reevaluate China and makes relevant policy about China. However, the knowledge of Europ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rnity of Europe, thus formed the "post-modern" 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ch has caused the deviation of Europe's knowledge from the real China. (HU Jian)

View of Material and Reputation G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 Utilitarianism is one of the theories that dominate the west moralit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arxism, it is an issue of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a dialectic analysis of utilitarianism, Marx and Engel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ns should appeal to socialist r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ve relations. Mao Zedong propose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view of utility with focus on the proletarian interests. Deng Xiaoping proposes the people's view of utility and set as the standard the "three helps". Hu Jintao proposes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utility with priority on people to maintain the essential interest of the people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man. (DING Cheng-ji)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Roots of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Domesticated Marxism —Also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iews of the Party Leaders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herent value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active force to unite, coordinate and promote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brings Marxism successfully to China.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ree represents",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me into being and guide the progressive course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eries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domestication of Marxism. (LI Qing-yun)